

我與武漢三十年

用三十年，理解武漢和一個人。這是一個武漢普通市民的三十年，一個武漢改革開放事業參與者的三十年，也是一個武漢公務員職業生涯的三十年。

袁善臘·著

人民日報出版社

我與武漢三十年

袁善臘·著

人民日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与武汉三十年 / 袁善腊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115-1439-4

I. ①我… II. ①袁…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6990 号

书 名: 我与武汉三十年
著 者: 袁善腊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宋 娜
封面设计: 鲁 黎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编辑热线: (010) 65369521
网 址: 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256 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1439-4
定 价: 36.00 元

与一座城市共命运

——读《我与武汉三十年》

李鲁平

很多人都经历了武汉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20 世纪 80 年代初，作为一个从农村通过高考来到武汉的学生，我也幸运地见证了武汉这座城市的三十年，三十年中这座城市每天都在发生变化。

三十年前，就武昌而言，我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就处于城市的边缘。从华师东门往华师二附中的虎泉一带都是郁郁葱葱的农田；从华师往南到南湖还没有道路，被茂密的山林阻隔。对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来说，那时候，从华师往东到鲁巷的武汉化工学院是令人畏惧的、需要强大勇气的长途跋涉。沧海桑田，三十年间，从雄楚大道往东到葛店、往南到纸坊的广大地域，已经难辨旧时的面貌。

无疑，每一个人也是以不同的方式经历城市历史的，《我与武汉三十年》就是袁善腊先生经历武汉三十年的独特的方式。《我与武汉三十年》二十余万字，有随笔、纪实、访谈、序言、讲话、书信、即兴致辞等体裁形式，内容涉及文艺、经济、教育、科技等多个领域，既是作者三十年的人生历程和事业经历的记录，也是作者三十年对一座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观层面的理性思考。《我与武汉三十年》全书分为三辑，第一辑“随笔”、第二辑“资政”、第三辑“附录”。第一辑“随笔”收入作者 22 篇文章，其中有艺术评论、诗评、散文、序言等；第二辑“资政”收入了作者的书信、读书评论、讲话、致辞等 26 篇；第三辑“附录”收入的相关文章，除“手机短信对话摘选”“即席讲话摘录”外，或者文章的作者是袁善腊先生过去的同事、朋友，或者文章所写的内容涉及袁善腊先生过去的工作；或者所写到的事件是袁善腊先生领导、参与过的事件。

要全面准确概括这本书的内涵显然十分困难，但作为第一读者，我坚信这是一本可以用来理解武汉三十年历史的书，是一本可以用来理解一个人的权威的工具书。可以说《我与武汉三十年》是一个武汉改革开放事业参与者的三十年，是一个武汉市民的市民生活的三十年，也是一个武汉公务员职业生涯的三十年。

一座城市三十年发展历程的折射

毫无疑问，《我与武汉三十年》不是一部专门书写武汉三十年历史发展的经济学或者社会学著作，但我们从其中的每一篇书稿，都可以感受到武汉这个城市的呼吸，看到这个城市前进的脚步。

武汉的现代化发展是建立在历史之上的。其中，张之洞治鄂所推行的一系列新政实现了武汉走向近代化的历史性发展。张之洞在湖北采取了一系列扶植、奖励工商业的措施，使湖北的近代工商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张之洞推行的以兴办近代工业为核心的“湖北新政”，使武汉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运动的发祥地。汉阳兵工厂为国内最大军工厂，汉阳铁厂规模宏大，号称“东亚雄厂”，武昌纺纱、织布、制麻、缫丝四局的建成投产，又使武汉成为全国少数几个纺织工业基地之一。在辛亥革命前，武汉形成了钢铁、机械、轻工、纺织工业基地。张之洞在武汉兴办近代学堂新政、出国留学新政、教育管理新政、教育经费新政、师资建设新政、充实图书资料和科教仪器新政，使武汉成为当时的著名文化教育基地。辛亥革命前，武汉城市总人口接近 100 万，市区规模在修筑京汉铁路、张公堤之后扩大了几十倍，已经形成近代化的市容市貌。武汉现代化发展的另一个基础是新中国成立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在全国确定了 156 个苏联援助的重点建设项目，其中在武汉安排了七个项目：武钢、武重、武锅、武船、武汉肉联、青山热电厂、武汉长江大桥。

可以说，三十年前的武汉，就是由这些历史积淀所构成或描绘的。我们记忆中其他的关于武汉的景象，都是此后改革开放三十年在这座城市上的叠加或重构，从基础建设面貌的变化到市民生活变化和心理感受，都是这三十年之中



▲ 陪同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左三）考察武汉软件职业学院，左二为谭仁杰，右二为张平，左四为廖世平

时间之手巧妙而伟大的创造。估计很少人能够如数家珍地梳理出武汉这个城市的每一个细微的嬗变。

但在《我与武汉三十年》一书中，通过《竹影扫阶尘不动——回忆我与郭友中教授的师生交往》、《亦师亦友，一个大写的人——我与殷增涛书记共事的岁月》、《人到云中海似杯——回忆姜兆基市长》、《平民市长 草根情怀——与阮湘华先生对话录》、《“武汉·中国光谷”是湖北百年工业化发展的结果——与朱建国、万峰、熊红三记者的访谈》、《逆势而上的武汉工业——答〈中国经贸导刊〉记者问》、《认真总结武汉在改革开放中经历的复兴之路——〈2011 武汉发展报告〉序》、《大学城是武汉现代化的基石和未来的希望——在赵鹏大院士八十华诞庆祝会上的讲话》、《干铺路石工程 建常青树企业——〈武汉高科创建 10 周年纪念〉序》、《建设一支强大的浩浩荡荡的高科技产业大军——〈武汉民营科技 20 年〉序》、《总理批办的一件优秀提案》、《10 年乙烯梦》、《巨变的十年——我经历的武汉教育事业发展》、《一部沉甸甸的武汉新闻史》等文章，我

们完全可以把三十年武汉的发展历史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重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她是如何一步一步转型、一点一滴脱胎换骨的。

比如，通过《竹影扫阶尘不动》我们可以了解到关东科技园和关南科技园的启动和建设，武汉创业中心、武汉孵化器的建设，“东湖高新”的上市，长江中游华中经济区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的开展，等等。比如，通过《亦师亦友，一个大写的人》，我们可以重新回忆起武汉从1983年开始的改革历程，武汉城市综合体制配套改革、“两通突破”、实行计划单列、开放蔬菜副食品市场、搞活企业、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等一系列重大改革，还有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的武汉市的重大基础建设，天河机场一期工程、长江二桥、白沙洲大桥、轻轨一期等；以及2002年根据罗清泉书记指示精神，殷增涛同志主持市委研究室开始武汉城市圈暨周边城市群的调研，为国务院2007年批准武汉城市圈建设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示范区提供了重要成果支持。比如，通过《人到云中海似杯》我们可以感觉武汉最初的改革开放气息，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区级财政，开展建立乡镇一级财政的试点工作；推行利改“税”改革；推进武汉金融组织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建设及各银行企业化、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武汉机场建设、长飞工程、乙烯工程、葛化工程、市属冶金企业交武钢等等重大项目的建设，尤其是长飞工程的起步和奠基。比如，通过《“武汉·中国光谷”是湖北百年工业化发展的结果——与朱建国、万峰、熊红三记者的访谈》、《干铺路石工程 建常青树企业——〈武汉高科创建10周年纪念〉序》、《总理批办的一件优秀提案》、《平民市长 草根情怀——与阮湘华先生对话录》等文章，我们可以把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关于东湖高新开发区如何从草创到成为国家级开发区的发展历史、中国光谷如何从提案变成全球顶尖技术和产业开发区的历史，重新链接、组织起来，从而看见一幅波澜壮阔、激动人心的图画。当然，通过《从宁波帮到海纳百帮：解读武汉现代化的一个视角——读〈汉口宁波帮〉》、《口述武汉沧桑历史——读〈大武汉记忆〉》、《一部沉甸甸的武汉新闻史——〈月涌大江流〉读后》等，我们则可以感受这座城市的另一面，她的精神历史、心灵记忆、社会风情、文化流动。

我们诚然可以通过年鉴和经济史等方式，再次进入一个城市的历史世界，但，我们通过一个人的人生历程进入一座城市的历史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因

为，我们通过《我与武汉三十年》进入武汉的三十年历史时，我们获得的不仅仅是历史事实和线索，我们获得的还有参与历史过程和创造历史的具体的人的情感和命运。

一个公务员三十年的人生见证

从下放蒲圻羊楼洞茶场的一名知青到返城，从80年代初一名农业系统的普通干部到市委研究室到东湖高新区到市政府领导，袁善腊先生无疑是武汉三十年的历史见证人之一，《我与武汉三十年》当然也是袁善腊先生见证历史的记录。首先，他见证了姜兆基、郭友中、殷增涛等武汉三十年历史上重要的领导者，他们不仅仅是武汉三十年改革开放具体的执行者，也是引导、影响作者的师长；他见证了武汉光谷从无到有，武汉东湖高新区的从无到有；见证了武汉乙烯从梦想到现实；他见证了武汉教育十年的辉煌发展；他见证了武汉民营经济的几十年发展；见证了武汉高等教育几十年的巨变；当然不用说，他也见证了武汉三十年基础设施和城市面貌的天翻地覆……

这些当然都是武汉现代化进程的宏大叙事。

同时，袁善腊先生也是武汉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世界的见证者。他尊重知识、重视人才，与大师、名师、院士等保持良好的沟通和联系。《永远的校长、永远的大师》见证了教育家刘道玉的人才观；《一位音乐大师与东湖的情缘》是我国著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终身教授周小燕与武汉文化、与东湖文化建设的见证；《刘永定：中法科技交流合作的模范——在刘永定研究员获得法兰西棕榈统帅勋章授勋仪式上的讲话》、《大学城是武汉现代化的基石和未来的希望——在赵鹏大院士八十华诞庆祝会上的讲话》是刘永定、赵鹏大两位教授在各自领域里影响和成就的见证；《最后的士大夫——〈教育之树常青〉序》是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品格和境界的见证……这些不同的见证唯一相同的是，这些大师都工作或生活在武汉或者与武汉的文化、精神世界有着密切的关系。足球文化是城市现代化一个动感的符号，《武汉职业足球俱乐部退赛纪实》则是武汉一个城市、一个企业、一群热爱足球的人及无数热爱足球的人几十年奋斗的努力遭到挫折的见证。《秉承首义精神和创新精神，建设美好

家园——在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文史馆员书画艺术精品展上的讲话》、《在培养农民作家、繁荣乡土文学上有所作为——在 2012〈芳草·潮〉团风笔会上的讲话》、《鲁虹艺术批评中的难解情结》、《艺术与经济、与生活、与城市的“互动”——“互动——2008 中国当代油画邀请展”前言》、《武汉的诗人应该在中国有一席之地——从〈旋转的镜面〉说起》等则是袁善腊先生关心武汉文学艺术繁荣发展的见证。比如，作者在《艺术与经济、与生活、与城市的“互动”》中强调城市经济的发展之后要更多地支持艺术生产，艺术生产的活跃要为城市的发展注入活力。这一点可以作为他多年的职业生涯的一个注释。多年以来，他重视对文学艺术的投入和支持，同时也期望武汉多出名人出名品，为打造名城作出贡献。

而《幸福指数是评价考核的核心——读〈告别 GDP 崇拜〉》、《读〈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并致陈清泰主任》、《借鉴深圳创新模式，推动中国高新区持续发展——致张景安理事长信》、《走好武汉科学发展之路——在省委学习十七大精神读书班上的发言》、《创建创业型城市是城市化进程的客观需要——在全国创建创业型城市市长培训班上的发言》等则是袁善腊先生人生的另一种见证，是作为一个公务员执政理念的见证。比如他在《幸福指数是评价考核的核心——读〈告别 GDP 崇拜〉》提出“告别 GDP 崇拜，关键是要贯彻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理念、评价体系及考核机制”，并认为应该把幸福指数作为评价考核的核心。作为一个长期在领导岗位上参与一个城市改革发展设计的公务员，对一个有着广泛基础和影响的评价体系提出这样的批评和建议，当然是需要勇气和胆量的。比如他在《读〈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并致陈清泰主任》提出的我国“社会贫富差距变化”的最大隐患还是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涉及 2 亿多“农民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更加注重中国高新区在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的作用；抢占高科技制高点和形成高水平的世界制造中心将成为我国长期并重的战略；尽快调整和完善资源税，以实现低碳发展、可持续发展；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财权，一方面要削弱地方过度追求短期 GDP 的动机，同时也要给予地方更多实现科学发展空间等观念，显示了一个大城市领导者对全局性问题的独到思考。比如他在《借鉴深圳创新模式，推动中国高新区持续发展——致张景安理事长信》

中总结的中国两支产业大军都已具备国际竞争力，但在开拓新兴市场、抢占高科技制高点上都任重道远，分明是他多年主政开发区建设的思考结晶。《走好武汉科学发展之路——在省委学习十七大精神读书班上的发言》、《新在生态——在花山生态新城总体规划院士专家咨询会议上的致辞》则都是在科学发展观的宏观背景下，对武汉两型社会建设的思考，其中对花山新城规划提出的“要统筹协调城乡发展，在建设一座现代化城镇的同时，真正让农民安居乐业，闯出一条在推进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城乡协调发展的新路子”是他对当代城市化进程的一贯思考的延续，在《芳草·潮》发刊词以及编委会上，他多次强调用城乡协调发展解决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现象和问题，包括农民工问题。这些体现的不仅仅是袁善腊先生作为一个公务员的智慧和才学，折射的也不仅仅一个勤于思考的公务员的精神面貌或者品质，更重要的，折射的是一个公务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换一句话说，反映的是作者对这座城市的深深热爱，唯有爱，才如此殚精竭虑。

一个武汉市民的情怀世界

我们不用回避，本书的作者因为长期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并身处领导岗位上，所以，人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其作为政治生活主体的一面。但政治并不是超然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相反，它深深植根于人们的生活中。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说过，“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是生活在政治生活中的，或者是生活在政治关联中的。因此，提出“政治人”一词的著名政治学家李普赛特在《政治人》一书中把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人都视为“政治人”，但同时，他认为，人的政治生活也有社会性的一面，所有参与政治的人又都是与丰富广博的社会生活水乳交融的。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人的政治性和政治的社会性”。

从这一角度，再来阅读本书，我们对作者及其人生将获得更加丰富的认识 and 了解。在作者的职业生涯中，不仅仅只有政治事务和行政管理，还有与教师、科学家、音乐家、作家、美术家的友谊，也有与青年时代的同窗好友的交往，也有与职业生涯中的同事、师长、领导的合作与共事，等等。

在本书中，有不少文章都涉及作者青年时代的好友，比如《鲁虹艺术批评中的难解情结》，作者在短短的篇幅里，总结了鲁虹四十年艺术生涯的三个情结，更重要的是作者把与鲁虹一同经历的中学时代和一同经历的插队生活作为鲁虹不可割舍的情结之一，既真实确切又独具洞察。从某个角度看，对中学时光的眷念和对知青生活的不断回味，又何尝不是作者自己的情结？如同作者对鲁虹的概括“他的心始终牵挂着那坐落在长江汉水交汇处的美丽的江城”，其实，作者自己也是如此。正是因为这一情结，作者在三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才对这座城市始终充满炽热的深情。《濛濛细雨送张斌》在一千一百字的篇幅里，把武汉知青张斌1968年下放蒲圻，从生产队走上副镇长、副市长、政协副主席、蒲纺集团董事长的职业人生，把张斌从农业生产到招商引资、电厂建设、蒲纺解困等事业历程，勾画得简略有致、荡气回肠，尤其写到张斌80岁的母亲从武汉赶到蒲圻祭奠儿子，写到张斌的女儿与来自武汉的父亲的知青朋友的拥抱和痛哭，写到张斌因为挂念蒲圻发展，婉拒调动回武汉，写到张斌把自己看成蒲圻与武汉的桥梁，梦想把蒲圻建设成为武汉的后花园……这些细节以及张斌从17岁开始扎根蒲圻43年的人生，足以感动每一个读者。毋庸置疑，作者在这一千一百字的短文里，是浓缩了四十多年的深厚情感的。可以说，这篇短文的文字间流露的不仅是作者与张斌两个知青之间的私人情感，而是带着对四千多名下放蒲圻的武汉知青的深情，是一代人的情感。

《捍卫曾经年轻的辉煌与梦想》一篇极富意味的短文，在不过千字的篇幅里既有对唐翼明学术生涯、人生漂泊的记述，也有对唐翼明先生书法艺术的赏析，也有作者自年轻时代与唐翼明先生的交往脉络。因此，它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书法展览的序言。但我觉得作者更想表达的是，唐翼明的书法饱含着由于人生漂泊而富有的沧桑雄浑，在这一艺术特征背后是唐翼明先生对祖国和武汉的热爱与眷念之情，因为这里有他年轻时代的辉煌和梦想，而这个地方，现在已经由十里洋场演变为艺术交流的殿堂。这里面也隐含着作者作为武汉市民一员的自豪。《清水无香谭崇台》记录了作者与经济学家谭崇台的交往。令人惊讶的是，作者清晰地记得每一次与谭教授见面，谭教授所说的话。1986年谭教授在党校给作者授课所讲的三个观点：增长不等于发展；要高度重视中国发展中的二元经济结构；要关注小城镇的发展和劳动力合理流动。2006年武汉市政府接待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里茨教授时，谭先生对进入 21 世纪后我国所出现的“丰裕中贫困”发表的独特看法。谭先生认为，这种贫困在本质上与西方曾经出现的类似现象不同。不仅存在需求不足和公开失业，而且还存在发展中国家特有的经济结构失衡、庞大的隐性失业和绝对贫困等问题。2008 年在谭先生执教 60 周年庆典活动上，谭先生说的是“我绝不是泰山北斗，我做得很不够”，“我只是一名称职的教书匠”。这种准确的记忆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品质。三次见面，三种不同内容的讲话，前两次大师的讲话已经变成作者在武汉市政府工作的思考、决策的智力源泉，在我的记忆中，作者在不同的场合经常谈及二元结构和劳动力流动问题，并且在领导《芳草·潮》的编辑工作中，更显示出这样一种深邃的眼光。正是因为二元结构，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才涌现出劳动力转移、农村人口转移以及农民融入城市等等系列问题，这也正是创办《芳草·潮》这样一个服务于城市化进程的平台的背景。而第三次讲话的内容则充分展现了谭先生的平淡、从容的大师风范。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作者对大师的崇敬。

《人到云中海似杯》、《亦师亦友，一个大写的人》、《竹影扫阶尘不动》等篇章，都是有关作者与武汉市不同时期领导、师长的交往。《人到云中海似杯》不仅叙述了一个老领导的工作作风和对武汉发展的贡献，比如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武汉开始改革开放，姜兆基市长参与或领导了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区级财政，开展建立乡镇一级财政的试点工作；推行利改“税”改革；推进武汉金融组织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建设及各银行企业化、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武汉机场建设、长飞工程、乙烯工程、葛化工程、市属冶金企业交武钢等等重大项目的建设，尤其是长飞工程的起步和奠基。在这些对后来武汉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的改革中，姜兆基市长都是身先士卒，亲自“跑北京”、“跑项目”、“跑工地”，一个“跑”字凸显了那一代城市管理者的工作作风和精神面貌。更重要的是，文章通过姜兆基市长的举荐人才，通过姜兆基市长带着“我”到与开发区相关的厂矿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调研，有意让“我”熟悉情况和接上关系等细节，烘托出老一代领导干部的宽广胸襟和对年轻干部的润物细无声似的培养。从今天袁善腊先生的身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老领导言传身教的深远影响，在我不多的接触中，几次目睹耳闻他

把年轻的干部介绍给有关部门，并请求有关部门对武汉年轻领导的支持。在《亦师亦友，一个大写的人》中，作者不仅介绍了殷增涛书记带好一个班子的水平以及人格魅力，还通过殷增涛书记亲自领导或参与的武汉重大建设项目、重大事件（长江二桥、东湖保卫战、98 抗洪、战胜“非典”、文化体制改革、六城会、八艺节等），呈现出殷增涛书记的领导才能和他在领导岗位上对武汉这座城市的贡献。文章也同时介绍了殷增涛书记对陈伯华、程云、沙莱、夏菊花、吴雁泽、夏雨田、曾卓、刘醒龙等文学艺术家的关心，介绍了殷书记的创作和退居二线后对中山舰旅游区建设、老年大学、海外交流等工作的倾尽全力，这些细节呈现出来的是殷增涛书记对生活的丰富情怀、对追求的不竭激情。在位时的领导角色也好、不在位时的市民角色也罢，殷增涛书记精神和灵魂深处的支柱始终是对武汉人民福祉的牵挂，正是这一不动摇的“牵挂”使得他一直在不停地“跋涉”。在我看来，这一精神也是作者袁善腊先生自己的写照，每每看见他依然忙碌的身影和依然充沛的激情，我便不由自主联想到殷增涛书记诗集《不停跋涉的青春》中的诗句“纵遇歌逢酒，仍话拳拳丹心”。我坚信，对武汉这座城



▲ 原科技部部长徐冠华（中）在东湖开发区调研，右一为火炬中心李燎处长

市，作者始终怀着“拳拳丹心”。《竹影扫阶尘不动》则叙述了郭友中一个科学家兼副市长的独特个性，他睿智，比如依托大企业启动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他坚定，比如对有争议的干部，力排众议、坚决支持；他焦急，比如当有人对光谷建设不理解，即使退居二线，也要利用各种方式宣传和呼吁；他热心，比如积极促成陈香梅女士访问武汉并翻译陈香梅女士的著作，扩大武汉与美国的文化交流……他也有信仰，比如他信奉“与有肝胆人共事，向无字句处读书”，这就是郭友中，一个数理物理学家、一个曾经的武汉市副市长。一个在“文革”中在冤狱中耗费了青春年华的科学家，一个在 20 世纪初又成为这座大城市领导的知识分子，他给作者的影响是能够坦然接受这两种反差极大的人生境遇，并且从未失去对事业的热情和对所生活的这块土地的热爱。

三十年后的今天，从华师的东门往东、往南的广大版图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国家级开发区即武汉东湖高新区，一个生机勃勃、在世界同行业保持强大竞争力的中国光谷。上万家企业聚集在这里，光电子信息产业、能源环保、生物工程、新医药、机电一体化、高科技农业竞相发展，一块技工贸总收入超过 4000 亿元、财政收入超过 100 亿元的富裕之地。三十年，这块土地由农村演变为武汉最具创造力的城市。她对于我，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陌生的，但对袁善腊先生来说，这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角落的过去和现在，他都烂熟于心。今天，即使你生活在武汉，即使你生活在东湖高新区，你面对开发区里面无数的道路、建筑、厂房、园区，你也可能会犯迷糊，但袁善腊先生几乎认识这里的每一条道路、了解这里的每一幢厂房、知道这里的每一个园区或者建筑；他几乎认识每个企业的负责人或者来这里创业的研究人员、工程师……他对每个企业的来龙去脉可以如数家珍。这就是历史，是鲜活的历史，是武汉现代化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他个人的生命史的一部分。

对一个长期从事行政管理的领导，只有深入到他生活的城市，深入到他成长的历史，深入到他的职业生涯，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和认识。《我与武汉三十年》就提供了这一环境，其中既有袁善腊先生生活和工作的这座城市的历史，也有他自己的人生履历。当我们在《我与武汉三十年》中感受武汉的三十年时，我们分明听见了袁善腊先生匆忙的脚步、看见了他忙碌的身影、甚至感受到了他的心痛、他的欣慰、他无声的呼吁、他深沉的热爱……无论是他理性地思考

武汉的发展，还是感性地叙述与大师的交往；无论他介绍自己的领导和师长，还是介绍文学艺术，我们都能感受到他对这座他为之付出了人生的城市的自豪，也能感受到他对这座城市三十年取得的成就、开创的局面的珍惜，以及由此而来的呵护之情。

2012 年 9 月

五易书名（代前言）

几年前，我开始筹划将近 20 年的文稿整理出书的问题，既是一个人生的记录，也是希望充实退休后的生活。

文稿是现存的，工作量不大，倒是书名颇费了一番心思。

最初的书名是《和大师同行》。我在市政府工作期间，一直强调把“建名城、树名人、出名品”作为工作追求的一个目标。特别是在东湖高新区工作 12 年，主要服务于大学、科研院所，在建设一支强大的、浩浩荡荡的高科技产业大军的同时，建设了一座环境优美、让子孙后代自豪的大学城、科技城。我不会忘记在和科技工作者、企业员工朝夕相处的岁月中，我学到了他们很多优良品质。他们的爱国敬业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独立的人格力量、清静俭约的胸怀、大智若愚的风范，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文稿及照片中涉及的中国工程院徐匡迪院长、周济院长、徐冠华院士、陈竺院士、陈宜瑜院士、赵鹏大院士、杨叔子院士、叶朝晖院士、殷鸿福院士、李德仁院士、赵梓森院士、裘法祖院士、张启发院士、张金麟院士、郑楚光教授以及《清水无香谭崇台》等文章都记录了这些大师对我做人、做事所产生的影响。但在征求朋友们意见时，大家只支持我的思路，不支持用《和大师同行》的书名，大家担心有“自我表扬”之嫌。

只有忍痛割爱，书名改为《最后的士大夫》。这是我为张薇之先生的《生命之树常青》一书作序的题目。在副市长岗位上，我负责联系教育战线工作，张薇之作为新中国第一任市一中校长、武汉市教育局老局长，他和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李健书记，华中师范大学老校长章开沅、马敏，华中科技大学老书

记朱玉泉、路钢书记、李培根校长，中国地质大学老校长张锦高、郝翔书记，武汉理工大学老校长周祖德、张清杰校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吴汉东，华中农业大学李忠云书记、邓秀新校长，武汉工程大学吴远欣书记，中南民族大学陈达云书记，湖北美术学院老院长唐小禾等，都是我很敬重的教育家和校领导。《最后的士大夫》既表明了我对这一批教育家的“高山仰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怀念，同时也是希望弘扬这一代教育家的一种境界、胸怀和风骨。包括《竹影扫阶尘不动》一文中，我非常敬仰的郭友中老市长“一介书生、一生布衣、一身正气”的本色，也表明了这个愿望。去年9月9日，我收到张薇之夫人刘清华老师的信，其中有一段是对《最后的士大夫》所作修改的说明：“《薇之论文集》已经印好成册，您为他书写序言，给予很高评价，我们感到荣幸并受到很大鼓舞。再次向您致谢！由于时间匆促，对您序言题目有所改动，未能及时与您交流就付印了，这一点向您表示歉意，希谅！”尽管我对《最后的士大夫》的表述还是持保留意见，但我必须尊重张老家属的意见。

书稿第三次易名为《又见西风素月丹枫》，这是借用南宋词人周密的一段



▲ 陪同原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院士（前排左一）考察武汉“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第二排左一为市委副书记胡曙光